

# 论近代小说观念的嬗变及其新特点

李 联 君

(四川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 成都 610101)

**摘要:**近代小说观念作为古典小说观念的终结和现代小说观念的萌芽,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并出现了一些新特点。维新运动前主要是继承传统,又在鄙视小说为“闲书”中出现一些新变化;伴随维新运动的酝酿与来临,小说渐渐受到较多的重视,社会功能得到关注与强调;资产阶级改良者大力提倡小说,着眼于抬高小说的社会地位,力争让小说进入文学殿堂。之后,鸳鸯蝴蝶派强调娱乐消遣功能的小说观念,表现出对传统小说观念的继承与回归。

**关键词:**近代;维新运动前后;小说观念;传统;变迁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0)05-0086-07

近代小说观念作为古典小说观念的终结和现代小说观念的萌芽,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并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在整个 80 年中,大约以维新运动前后为界,小说观念的嬗变大致可以分成渐变和突变两个阶段<sup>[1]</sup>。

## 一 继承传统,在鄙视小说为“闲书”中出现一些新变化

维新运动前,小说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小说未被列入文学之列。如近人编辑百科全书性质的大型工具书《辞海》,其文学分册专门列了“总集”一类,但其总集类所列举的例子只是些诗文总集的名目,而未列“小说总集”的书目。

其时著名报刊《申报》及其编辑们的小说观念仍停留在传统小说观的沿线上,依然受传统小说观的束缚,未摆脱传统小说的故事模式及价值取向,视小说为“闲书”。1877 年十月十七日(农历)《申报》有“寓沪远客”登载广告,谓“《有图求说》出售”,“兹有精细画图十幅,……照图编成小说一部”<sup>[2]</sup><sub>11册,495</sub>。为此,《申报》特地配发了题为《书请撰小说后》的评论:“近来稗官小说几乎汗牛充栋,然文人同此心、同

此笔而所撰之书各不相同,实足以开拓心胸,为消闲之一助。但所阅诸小说,其卷首或有图,或无图,从未专有图而无说者。兹见本报后寓沪远客所登之请撰小说告白,似即征诗征文之遗意,文人雅士于酒后睡余,大可借此消遣工夫,行见奇情壮采奔赴腕下,而诸同人又得击节欣赏矣。”<sup>[2]</sup><sub>11册,495</sub>从这段评论,可以窥探《申报》及其编辑们的小说观,广告要求“小说一部,约五万字”,《申报》评论“似即征诗征文之遗意”。小说虽早已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而存在,然而“征诗征文”古已有之是“雅事”,征小说却是“遗意”、新鲜事,潜意识中含有小说乃“不雅”,不能登大雅之堂之意。编辑们认为小说的功能乃“文人雅士于酒后睡余,大可借此消遣工夫,行见奇情壮采奔赴腕下,而诸同人又得击节欣赏矣”,“开拓心胸,为消闲之一助”,小说内容追求“奇情壮采”,小说创作仍然是文人雅士酒后睡余的消遣之作。

当时社会上更是普遍把创作小说看作是“小道”,作品往往署笔名,仿古代文人“游戏笔墨”之意,不肯现出真身。1872 年,蠡勺居士(本名蒋子让)在翻译英国小说《听夕闲谈》时所写的刊载于《瀛寰琐

收稿日期:2010-05-13

作者简介:李联君(1971—),女,重庆合川人,四川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讲师。

记》的《〈昕夕闲谈〉小叙》中,认为小说“以怡神悦魄为主,使人之辘轳此世者,咸弃其焦思繁虑,而暂迁其心于恬适之境也”<sup>[3]541</sup>,他强调小说赏心悦目的娱乐作用,正是传统“以文为戏”的观点的余绪。这从“寓沪远客”广告登出后人们的反应也可得到说明。广告登出之后,申城“文人雅士”的反应极其冷淡,至期满时,竟只有“安闲先生”一人应征。此后,征文的期限一再放宽,直到1878年5月22日,“寓沪远客”方才公布结果,该日《申报》载有“《有图求说》取列”的启事:“启者,前所请撰之小说,今仅收到安闲先生与蓬山居士两卷而已,俱未见甚佳,皆难刊印,惟依原白强分甲乙,以安闲先生为一,酬洋二十圆,蓬山居士居二,酬洋十圆,准于本月二十二日三点钟,在《申报》馆面交,届期莫误。此后,如有能撰得更佳而合刊印者,亦许酬谢,特此谨白。”<sup>[2]12册,571</sup>本次征文前后历时半年多,却只收到两篇未达到刊印要求且署笔名“安闲先生”和“蓬山居士”的征文,最后不得不草草收场了事。事实上,“寓沪远客”征文的失败,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在人们的观念中小说依然不能登大雅之堂,小说仍称之为“稗官小说”,小说仍然没能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

此时,小说虽然未得到足够重视,但开始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尽管在小说观上蠡勺居士还是因袭传统,但他也最早向鄙视小说的传统观念发出了呐喊:“谁谓小说为小道哉?”还有,蠡勺居士对西洋小说的接触本身,亦已经标志着传统小说观向近代小说观的过渡。《申报》“寓沪远客”登载广告,谓“《有图求说》出售”,照图编小说,在晚清社会本已是新潮之举,而向全社会公开征求小说,则更为罕见。

## 二 小说对变易风俗、社会革新具有“不可思议之力”

伴随维新运动的酝酿与来临,小说渐渐受到较多的重视,功能得到关注。距离第一次征文启事十多年后的《申报》及其编辑们的小说观念,已脱离传统观念束缚,已摈弃“小说乃不雅,不能登大雅之堂”等遗意,而强调小说具有感动人心、变易风俗等社会功能,甚而视小说为社会革新的工具。1895年5月25日《申报》第二次征文,登载了傅兰雅的“求著时新小说启”:<sup>“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习气不难为之一变。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兹欲请</sup>

中华人士愿本国兴盛者,撰著新趣小说,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说,结构成编,贯穿为部,使人阅之心为感动,力为革除。辞句以浅明为要,语意以趣雅为宗,虽妇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述事务取近今易有,切莫抄袭旧套,立意毋尚希奇古怪,免使骇目惊心。……果有嘉作,足劝人心,亦当印行问世,并拟请其常撰同类之书,以为恒业。……英国儒士傅兰雅谨启。”<sup>[2]50册,495</sup>此则征文启事,产生了广泛、强烈的影响,应征情况亦颇令人满意:至1896年1月13日,共收到小说162部,因为“作者过多”,举办者将原定的获奖人数从7名扩增到20名,“皆酬润资”,《申报》一一公布了获奖名单。

略将两次征文相比较,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前后两者的差异及差异背后所隐含的小说观念变化或演进。其一,维新运动之际,社会对小说征文反响强烈,关注度高、积极参与。和第一次仅两人应征不同,这次应征者猛增到162人,由此数字可知,中国文人、中国社会对小说文体的兴趣在短短的18年(1877—1895)中,有了惊人的变化。社会反响如此强烈,和第一次征文比较反响如此悬殊,正体现了鄙视小说的传统观念的已然改变。其二,从应征者的前后两次征文署名的差别也可体察出小说观念的变化。第一次征文,两名应征者“安闲先生”与“蓬山居士”,使用的都是化名,没有抑或不愿透露真实姓名,署名风格亦和传统明清小说作者名号十分一致。但第二次征文则不同,仅从现知的20名获奖者来看,署真名者为10人,占总数的一半。除此,其中不少名字,诸如“望国新”、“格致散人”、“杨味西”、“醒世人”等,均带有颇为浓烈的晚清时代气息。征文小说署真名的背后体现着小说社会地位的提升,也体现着中国小说观念吹响了由传统旧观念向近代新小说观念演进的号角。

近代小说观念的主要方向在价值论方面,它非常强调小说的社会作用,并企图将小说作为有力的“文明三利器”,企图把小说从“稗官野史”的地位提高到为社会改革服务的地位,它把小说与政治、道德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强调小说的教化作用,要求小说家把小说作为开民智与新风尚的武器。作为“阐明小说价值的第一篇文字”的严复、夏曾佑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一文写于1897年,文章高度评价了小说的重要社会作用,认为小说“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乎出于经史之上,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

说部所持”；文章还强调了小说在社会变革时期的重要作用：“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有人身所作之史，有人心所构之史，而今日人心之营构，即为他日人身之所作，则小说者又为正史之根矣。”<sup>[4]2</sup>显然，《缘起》一文较之傅兰雅《求著时新小说启事》全面和成熟得多，“代表了时代最先进的文学观”，成为近代史阐明小说社会作用，提高小说地位的第一篇理论文章。

维新运动前后，早期改良主义者已经认识到小说的社会作用，看到了小说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力，这种作用和影响，甚至被认为高于经史，超过经史。梁启超明确指出：“盖全国大多数人之思想业识，强半出自小说。言英雄则《三国》、《水浒》、《说唐》、《征西》，言哲理则《封神》、《西游》，言情绪则《红楼》、《西厢》……此种势力，蟠结于人之脑识中，而因发为言论行事，虽具有过人之智慧、过人之才力者，欲其思想尽脱离小说之束缚，殆为绝对不可能之事。”<sup>[5]67</sup>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中，梁氏也曾说：“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sup>[6]</sup>他深刻认识到小说能代替经史启蒙大众，革新道德、宗教、风俗、学艺、人心、人格等教育功能，故而把小说摆在社会改革武器的地位上来强调小说的作用，把小说与政治、道德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强调小说可以新道德、可以新风尚。

梁启超的被视为近代小说理论的纲领性文献《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对小说的社会功能作了系统论述。所谓“群治”，即社会治理、人群教化之意，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即小说与社会之关系。该文涉及的理论问题很多，包括对小说地位的肯定、对小说价值的分析、对传统小说的批评和以小说作为改良手段的观点，等等。为了使小说能够具有“群治”的社会功能，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因为“小说界革命的中心主旨是启蒙——改良群治”，“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sup>[7]6</sup>。文章明确强调了小说与政治的关系：小说为政治服务，政治又离不开小说，小说与政治被梁启超拴在了一条线上，小说成了政治的载体。而且，作为其“欲新政治，必先新小说”理论的实践，他还发表了亲自创

作的被称为“小说界革命”代表作的中国第一部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是在观念上最重视小说的改良者，由“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发展到作为开启民智、改良社会的利器，以小说救国，也成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启蒙主义小说观的理论核心。

不过，梁启超关于小说社会作用的认识，并不是片面叫好，而是一分为二地看到这种作用有正负两方面。一方面，他看到小说在政治改革中的积极作用，如其把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即归功于小说、俚歌所起的作用，说“西国教科书之最盛，而出于游戏小说者尤夥，故曰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盖以乐童子，以导愚氓，未有善于是者也”。“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门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sup>[6]34</sup>。另一方面，梁启超又认为不健康的小说对国民产生负面影响：“大圣鸿哲数万言淳海之而不足者，华士坊贾一二书败坏之而有余。”认为中国古代小说得到了广大读者喜爱，但中国传统小说恰恰是从“毒万千载”这一负面发挥了其社会作用，“中土小说，虽列之于九流，然自虞初以来，……不出海盗海淫两端。陈陈相因，涂涂递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小说之在一群也，既已如空气，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则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可以识矣”，“小说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如是！”认为国民精神的消极性是影响社会改良事业的精神障碍，其根源在于小说中的陈腐思想，成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因此小说直接关乎“群治”，即民风、民气和民族心理的优势，并进而影响社会发展和国家兴衰。

梁启超的小说理论探讨主要指向小说与读者、小说与社会、小说与政治等具有强烈现实功利的问题，基本上是一种政治化、功利化的文学观，政治小说成为核心，“小说救国”的政治宣传成为中心。他代表当时最新的小说观念，虽然有其局限性，但在继承前人、借鉴和吸收外国小说的基础上，站在前所未有的高度来看待小说，打破了我国传统小说观念的束缚，在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明确树立起真正意义上独立存在的小说观念。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认为自梁启超把小说视为开通民智之津梁，涵养民德之必需，以之输入“国家思想”后，形成一代政治家、

小说家以小说为启蒙工具的自觉意识。

### 三 小说进入文学殿堂,成为“文学之最上乘”

梁启超作为在观念上最重视小说的资产阶级改良者大力提倡小说,立足点在于抬高小说的社会地位,力争让小说进入文学殿堂。

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小说观还是比较传统的,还主要是受康有为及黄遵宪的影响,并未对小说给予充分的注意。1897年,康有为、梁启超对小说有了崭新认识,但未把小说看作文学。康认为小说可以启蒙,主张以小说形式表述“经”、“史”内容,以教育童蒙、愚人、粗人。他有感于“书、经不如八股,八股不如小说”,“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的社会风气,认为“今中国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应将小说作为“今日急务”,提倡“经义史故,亟宜译小说而讲通之”,“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sup>[8]13</sup>。他认为日本维新之所以成功,实得力于小说著作。他在《日本书目志》中按15门类介绍日本的书籍时,把小说与政治、法律、文学等并列起来,自成一门。康有为把小说与文学并列起来,可见康有为并未把小说看作文学。

同年,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中开始认为小说具有通俗性教育性,开始提出革新小说的主张:“今人出话,皆用今语,而下笔必效古言,故妇孺农氓,靡不以读书为难事,而《水浒》、《三国》、《红楼》之类,读者反多于六经……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其为补益,岂有量耶!”<sup>[9]45</sup>此时的“广著群书”,小说虽然包括在内,但并非专指小说而言。在他眼里,小说亦未能从属于文学之列,他的小说文学观仍然停留在传统小说观的延线上。

维新变法失败后,尽管在梁启超的眼里小说与文学仍处于并列的行列,但他迅速扭转了对小说的态度,向鄙视小说的传统小说观念发出了彻底决裂的信号。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他指出“小说乃国民之魂”,他把小说抬升到“魂”的高度,这与他之前视小说特征为“俚语”的认识不同了,他超越了对小说的朦胧认识,因为小说能“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它的读者是“爱国之士”,其地位自然高了。梁还以

实际行动明证他看重小说、不鄙视小说的文学观念,他亲力亲为翻译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不仅明证他不鄙视并看重小说的小说观念,也表明他对域外小说的接受。同时他还运用小说作者的显赫地位来说明小说的高尚地位,如在介绍日本政治小说《经国美谈》的作者矢野龙溪时称之曰:“矢野氏今为中国公使,日本文学界之泰斗,进步党之魁杰也。”<sup>[10]42</sup>他这种大胆的观点与行为,是向鄙视小说的传统小说观念发出了彻底决裂的信号,使小说向文学靠近了一大步,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小说观念将要发生划时代的变化——那就是抬高小说的文学地位,让小说进入文学殿堂。如果不将小说纳入文学之列,还是等于承认小说“不入流”,要比文学低一等,只有将小说归于文学之内,才能真正提高小说在文学中的显赫地位,这点首先由梁启超在理论上提了出来。

梁启超不仅把小说纳入文学范畴,而且还提出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观点。他在《新民丛报》第20号的“介绍新刊”中,为《新小说》作了宣传,尤其是对自己最重要的小说理论文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作了介绍,他第一句便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观点,但仅凭叫、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这句空话,恐怕难以令人信服,于是,又马上加上“真话世学于域外者,多能言之”这句话。无疑想借助外国权威来建立小说的“崇高”地位。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达到了其小说观的集大成阶段。他强调小说在文学大厦中的重要地位,得出了亘古未有的“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论断,这已经远远超出了《译印政治小说序》的观点。此时梁启超的小说观已经跨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即将小说纳入文学之列,列为“文学之最上乘”,小说得到了重新定位,由文学结构的边缘地带走向中心位置,改变了鄙视小说的传统观念。他倡导的“小说界革命”,把小说从小道末技中解放出来,使传统小说观念受到一次强烈的冲击,带来传统小说观念的深刻的历史性变革。

戊戌变法把梁启超推上政治舞台的同时,梁启超也把以政治为载体的小说推上了文学的舞台。梁启超的目的是以小说为载体宣传政治,但意想不到的是小说在政治的光环下,其文学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梁的小说观发展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将小说回归到了文学领域去看待。小说的文学地位观由此更加突出了,梁启超将小说的地位提

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小说的社会地位尤其是文学地位的提高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此时的梁启超已经代表了当时最前沿的呼声,他的小说观念的转变乃至形成,在中国小说理论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观念经过梁启超的宣传终成了那时小说观念的最强音。即便是不太赞同梁氏主张的徐念慈,也认为“所谓小说者,殆合理想美学、感情美学而居其最上乘者”,袭取了梁的说法。而楚卿(狄葆贤)《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1903)说得更具体:“吾昔见东西各国之论文学家者,必以小说家居第一,吾骇焉。吾昔见日人有著《世界百杰传》者,以施耐庵与释迦、孔子、华盛顿、拿破仑并列,吾骇焉。吾昔见日本诸学校之文学科,有所谓《水浒传》讲义、《西厢记》讲义者,吾益骇焉。继而思之,何骇之与有?小说者实文学之最上乘也。”<sup>[11]61</sup>“小说,小说,诚文学界中之占最上乘者也。”<sup>[12]226</sup>

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认为自梁启超把小说喻为“文学之上乘”始,在新文学中小说开始作为中心文体被推重。于是,小说借着政治的提携,占据了文学殿堂的盟主地位。

#### 四 小说在新潮流中回归——“娱乐消遣”观念代替“开启民智”载道观

对梁启超等人对小说社会作用的过分强调,其时也有不同意见。黄人《小说林发刊词》一方面对小说“风行于社会”、“影响于社会”的繁荣局面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说“则虽谓吾国今日之文明,为小说文明可也;则虽谓吾国异日政界、学界、教育界、实业界之文明,即今日小说界之文明,亦无可也”,但同时又对过去轻视小说及当前过分夸大小说作用的两种倾向都表示了强烈不满:“虽然,有一弊焉:则以昔之视小说也太轻,而今之视小说也太重也。”<sup>[13]233</sup>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徐念慈,他认为,近代之前对待小说的态度“不免失之过严”,而当时梁启超等人的态度“又不免誉之失当”。由此出发,徐念慈指出,“小说固不足生社会,而惟有社会始成小说者也”。即是说,就小说与社会的关系而言,社会生活是第一性的,是小说赖以产生的土壤和源泉。徐念慈认为,小说是社会的反映,不仅表现在它所描写的“起居动作、离合悲欢”是现实的,而且它所反映的“精神湛结处”,即思想感情等内容也不能脱离社会。“小说与人生不能沟而分之”、“不能阙其偏端”,两者之间具

有密切的联系。小说可以将人类的“事迹”“记载”下来,不致留下缺憾,小说对人生具有认识、教育、美感和娱乐等作用,并通过潜移默化,逐渐发挥其效用。这显然比梁启超等人笼统地夸饰小说具有“支配人道”的力量要科学得多。

陆士谔也说:“况小说虽号开智觉民之利器,终为茶余酒后之助谈,偶尔诙谐,又奚足怪?”<sup>[14]360</sup>因此,虽然要高度重视小说的社会作用,但又不能作无限地夸大:既看到小说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密切联系和互为因果,又能指出两者的先后轻重,强调小说对于社会存在的能动反映。这种观点对于纠正梁启超以来片面夸大小说社会作用的流行看法,引导作家正确反映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以及注意开掘小说的审美价值等等,都有非常积极意义。

作为对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政治化功利主义小说观忽视小说自身特性的反驳,“小说游戏说”广泛流布于辛亥革命后至五四文学革命前。这种观念明确反对“有似正史”、政治功利的小说观,而提出“小说者,……或曰茶余酒后之消遣品而已,若夫补救人心,启发知识之巨任,非所责于小说也”<sup>[15]474</sup>。其中心观念是文学的娱乐主义、趣味主义、金钱主义。表面上看,这种观念与传统的“小说闲书论”有一脉相通处,但是,并不能为此把“小说游戏说”简单界定为对封建传统小说观念的复辟。其实,在游戏说思潮中,包含着一些新的小说观念的因素,带有鲜明的近代气息和近代职业小说家的特色,如鼓吹者在鼓吹“娱乐消遣”的小说观念时,又无不强调小说的劝诫作用,主张“借游戏之词,滑稽之说,以针砭世俗,规箴乎奸邪”。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了“小说革命”思潮之影响巨大深远,简直成了一切小说理论的不可或缺的“金字招牌”,另一方面也说明“游戏说”思潮虽然似乎包容了较多的传统“小说闲书论”的因子,但也并非简单重复。此后,“娱乐消遣”的小说观念迅速代替了“开启民智”的小说载道观,成为其时小说领域最主要的声音。

在主张“小说游戏说”的一批人中,鸳鸯蝴蝶派所属作家是典型代表。鸳鸯蝴蝶派作家大多接受过以小说改造社会的启蒙主义观念,包天笑就曾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译述过反映印度亡国惨史的《身毒叛乱记》,希望能以印度的民族灾难警醒国人,徐枕亚提出过“小说是为改良社会之一助焉”,李涵秋也曾说过“我辈手无斧柯,虽不能澄清国政,然有一枝

笔在,亦可以改良社会,唤醒人民”,但进入民国后,他们又都在不同程度上向“游戏消遣”的文学观认同,放弃了启蒙主义的小说观。

鸳鸯蝴蝶派的小说观念散见于他们的杂志、序跋。其中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论述是鸳鸯派的经典杂志《礼拜六》刊登的王钝根的《礼拜六》出版赘言:“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也。且买笑觅醉顾曲,其为乐转瞬即逝,不能继续以至明日也。读小说则以一小银元一枚,换得新奇小说数十篇,倦游归斋,挑灯展卷,或与良友抵掌评论,或伴爱妻并肩互读。意兴稍阑,则以其余留于明日读之。晴曦照窗,花香入坐,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故人有不爱买笑,不爱买醉,不爱顾曲,而未有不爱读小说者。况小说之轻便有趣如《礼拜六》者乎?”<sup>[16]459</sup>这里小说被视为一种“省俭而安乐”,“轻便有趣”的游戏休闲娱乐方式,而不再是新民救国的利器。类似的论调十分普遍,如瓶庵的“供野老闲谈之料,茶余酒后,各个人消闲之资,聊寄偶情,无关宏旨”<sup>[17]410</sup>,等等。1914年,鸳鸯派的代表人物徐枕亚明确提出“原夫小说者,俳优下技,难言经世文章;茶余酒后,只供清谈资料”,表示“有口不谈国家,任他鸚鵡前头;寄情只在风花,寻我蠹鱼生活”<sup>[18]461</sup>。而刘铁冷对自己所作小说的期望则是:“值此物竞剧烈之世,世人必多愁苦。苟读吾书而额上皱纹为之一舒,则吾之造福亦已不浅。”<sup>[19]469</sup>

小说曾拥有的神圣职责、崇高使命被迅速消解,即使有些关于小说的言论里还打着教化劝惩的旗号,但实质精神已相去甚远。小说观念在鸳鸯蝴蝶派这里转了一个大弯。梁启超对此反应强烈:“然则今后社会之命脉,操于小说家之手者泰半,抑章明甚也。而还观今之所谓小说文学者何如?呜呼!吾安忍言!吾安忍言!其什九则海盗与海淫而已,或则尖酸轻薄毫无取义之游戏文也。”<sup>[5]68</sup>可是,包天笑

毫不客气地明确反驳了梁的观点,反驳梁的小说可以塑造社会的功能观:“其推崇小说家也,曰大豪杰,曰大圣贤,曰大教育家,其位置之高,将升诸九天以上。今竟何如乎?则曰群治腐败之病根,将借小说以药之,是盖有起死回生之功也;而孰知憔悴萎病、惨死堕落,乃益加甚焉!向之期望过高者,以为小说之力至伟,莫可伦比,乃其结果至于如此,宁不可悲也耶!”包天笑和当时许多小说家一样已经发现,小说并不能塑造社会,相反,倒是社会塑造了小说以及小说观念:“子将以小说能转移人心风俗耶?抑人心亦足以转移小说,有此卑劣浮薄、纤佻蝶荡之社会,安得而不产出卑劣浮薄、纤佻蝶荡之小说?”<sup>[20]486</sup>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对那些要求小说传授学问的读者说:“须知吾之为此,仅欲博人一粲,若此功不成,则亦止令吾一人失望耳,于人复何伤!须知当此文明时代,人各怀物竞之思,竞而不胜,则抑抑如有所失,额上或多皱纹,脱见吾书而竟得辄然一笑,使皱纹立为消泯者,不已足乎!或日既见吾书,而爱群之心或动,稍生其敬老怜贫之思想者,则吾书亦不为无益于社会也。”<sup>[21]181</sup>鸳鸯派作家赞同欧文的观点,把小说作为休闲娱乐品,比如徐枕亚在《〈铁冷碎墨〉序》就直接引用欧文上述观点,还有如李定夷希望“仗我片言,集来尺幅,博人一噱,化去千愁”<sup>[22]6</sup>。

鸳鸯派强调娱乐消遣功能的小说观念表现出对传统小说观念的继承与回归,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小说界革命”忽视小说基本特性的反拨。小说观念此时回到传统,是小说在新潮流中的回归自我或自我解放。诚如朱自清先生所说:“在中国文学的传统里,小说和词曲(包括戏曲)更是小道中的小道,就因为消遣的,不严肃。不严肃也就不正经;小说通常被称为‘闲书’,不是正经书……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sup>[23]139</sup>

## 参考文献:

- [1]黄霖.中国近代文学批评研究的几个问题[J].文学评论,1994,(3).
- [2]申报[G].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1982.
- [3]蠹勺居士.《昕夕闲谈》小叙[G]//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4]阿英.晚清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 [5]梁启超.告小说家[M]//饮冰室合集(4).北京:中华书局,1989.
- [6]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M]//饮冰室合集(1).北京:中华书局,1989.

- [7]梁启超. 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M]//饮冰室合集(2). 北京:中华书局,1989.
- [8]康有为. 日本书目志[G]//陈平原,夏晓虹.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9]梁启超. 变法通议·论幼学[M]//饮冰室合集(1). 北京:中华书局,1989.
- [10]梁启超. 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M]//饮冰室合集(6). 北京:中华书局,1989.
- [11]楚卿. 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G]//陈平原,夏晓虹.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12]陶佑曾. 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G]//陈平原,夏晓虹.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13]摩西. 《小说林》发刊词[G]//陈平原,夏晓虹.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14]陆士谔. 《新上海》自序[G]//陈平原,夏晓虹.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15]纯根. 《小说丛刊》序[G]//陈平原,夏晓虹.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16]钝根. 《礼拜六》出版赘言[G]//陈平原,夏晓虹.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17]瓶庵. 《中华小说界》发刊词[G]//陈平原,夏晓虹.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18]徐枕亚. 《小说丛报》发刊词[G]//陈平原,夏晓虹.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19]徐枕亚. 《铁冷碎墨》序[G]//陈平原,夏晓虹.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20]天笑生. 《小说大观》宣言短引[G]//陈平原,夏晓虹.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21](美)欧文. 拊掌录·圣节夜宴[M]. 林纾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22]李定夷. 《消闲钟》发刊词[G]//芮和师,等. 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 [23]朱自清. 论严肃[M]//朱自清全集. 南京:江苏出版社,1988.

## On Changes and New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Fiction Sense

LI Lian-jun

(Fine Arts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It is inevitable for modern fiction sense to have remarkable transitional nature with some new characteristics as the end of ancient classic fiction sense and the burgeon of modern fiction sense, where it is mainly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 before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of 1898 with some changes among the contempt of fiction as “light readings”. Accompanying the deliberation of and coming of the 1989 movement, fiction gradually obtains more attention with concern for and stress on its social function. The bourgeois reformers vigorously advocate fiction, aiming at raising its social position and striving for its entering the palace of literature, after which the fiction sense of the yuanyang hudie school emphasizing its relaxation function shows inheritance of and return to the traditional fiction sense.

**Key words:** modern age; around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of 1898; fiction sense; tradition; change

[责任编辑:唐 普]